

小說家們

著 玉燕 金

□□□□□
小說家群體
小說家比較
小說家創作個性
小說評論
小說發展態勢
東

小 說 家 們

小 说 家 们

金燕玉 著

责任编辑 王轶军

出版发行：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165号，邮政编码：210009)

印 刷：常熟高专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80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精装本)

ISBN7—5343—1155—1

I·58 定价：3.80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小说家们(自序)

对于小说家们的考察，是一件意味无穷的工作。小说家们是魔术师，把小说这门艺术变幻出数不清、说不尽的文学作品。小说家们就像一座金矿，有淘不尽的金沙。

小说这门艺术，在小说家的手中变得富有弹性，得以不断改变形状，以成为他们更加得心应手的形式。这是考察的一个角度。

在小说这块调色板上，每个小说家调出了自己的颜色。区别和识别只属于某个小说家的应手，也是值得考察的一个角度。

两个小说家之间，存在不存在某种关系？或你们或相异，或交叉，或互补？不妨把具有可比船只的家作些比较研究，那会得到有价值的结你们啊，小说家们，我还看到你们一群一群地坐你们一条船只航行在文学的大海上。我尽力记下这些船只的标志。

也许因为我是女性，对于女小说家们总是特别关注，在浑厚有力的文学大合唱中，不难辨出那优美深情的女性文学的歌声。品味鉴赏这别具韵味的歌声是一种艺术享受。

从这些角度去考察小说家们，于是就有了关于小说发展、创作个性、比较研究、作家群等文章。我把这些文章集合起来，定名为《小说家们》。小说家们是我研究的对象和目标，是这本集子的书魂。这些文章合在一起，既在于说明文学现象，也在于提供研究方法。对小说家们有兴趣者，也许会从中得到启发。

我不敢说，我的文章将永存。但是，我敢说，我的文章是一种声音，是自己的声音。它们的根扎在理论和作品之中，作为我感受和思维的结晶出现，是独特的，也是实在的。

目 录

· 小说家们(自序)	1
· 小说家群体 ·	
论“复活”的作家群	3
论“知青”作家群	25
论女作家群	42
论军旅作家群	57
· 小说家比较 ·	
赵树理和高晓声：两个交融而又相异的世界	75
艺术世界的构筑	
——王蒙、陆文夫小说创作平行比较	89
茅盾小说类型及其影响	
——兼与鲁迅作比较分析	110
· 小说家创作个性 ·	
论陆文夫的创作个性	129

论高晓声的创作个性	156
论艾煊的创作个性	170
· 小说发展态势 ·	
开放→趋同→分化	
——新时期文学现象鸟瞰	187
一条自己的轨道	
——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崛起	202
· 小说评论一束 ·	
魂兮归来	
——析《蝴蝶》的心理透视	219
吞噬生命的《井》	
——对《井》的评论	226
啊，西部的人，西部的人生	
——读《桑树坪纪事》	233
艺术的开拓	
——谈简嘉的《青春作伴》	243
· 岁末有感(后记)	
	249

小说家群体

在文学发展的一定期内，在语言艺术家中逐渐形成的那种统一体，首先是从其对待现实的态度、对现实的美学认识、以及创作方法的一定的共同性作为其根源的。其次，引起属于特定文学思潮的作家们感觉深刻兴趣的那些生活的、创作的问题的近似之处，也是这种统一体的根源。

——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

论“复活”的作家群

——新时期作家群考察之一

复活，无疑是一种奇迹。

当中国的新文学跨入新时期后，文坛出现了一个奇迹：一批从五十年代中期就被错误地逐出文坛的作家“复活”了，用王蒙的话来说，就是“复活于文坛”^①。

他们重返文坛的准备时间是那样地长：整整二十年。二十年中，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或在都市小巷，或在农村，或在边疆，或在劳改农场，或在监狱囚室……身心两方面都受尽磨难。二十年中，他们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但

^① 王蒙：《漫话小说创作》第2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是出于作家的职业习惯，情不自禁地在观察和思索生活，在汲取艺术营养，头脑中的创作活动始终没有停止，甚至偷偷地写下了一些作品。

这一代“复活”的作家是带着二十年苦难生活的厚实积累，带着对人生、对社会、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带着浑身的艺术细胞重返文坛的。他们奉献于文坛的是一大批优秀的中短篇小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复活”，决定了文坛的“复活”，他们是当今文坛的先锋和中坚。

当我们在总结新时期文学空前繁荣的盛况时，难道能不提到王蒙、陆文夫、高晓声、李国文、张贤亮、张弦、邓友梅、丛维熙的一系列作品吗？他们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已经对新时期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一群“复活”的作家至少在三个方面深化和丰富了现实主义，推动了当代文学的演变和发展。

拭去历史的尘埃

在创作上，“复活”的作家群表现出一种历史地描写生活的倾向。他们的作品大都有几十年的历史跨度，在几十年时代风云的变幻中把握和展示人物的命运；对我们已经走过的历史道路作回顾性的描述，站在今天的高度去重新打量和认识过去，力图真实地再现建国以来几个历史时期生活的本质，力图弄清我们前进道路上遭受种种失败和挫折的原因；往往把生活中出现的新的冲突和问题，放到与历史的对比和关系中去反映，力图据此更加深刻地认识现实，用小说的形式去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种创作倾向是由我们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所决定的。“社会正像一个人一样，是某种生动的有机的东西，它有它的成长时期，它的健康和疾病的时期，它的痛苦和欢乐的时期，它的严重的危机以及走向痊愈和死亡的转折点。”①结束了“四人帮”的十年封建法西斯统治，清算建国以来极左的错误后，我们的时代正处在大病初愈、萌发生机、走向健康成长的伟大转折时期。我们的时代亟需思考、反省、认识、总结过去所走的历史道路，纠正以往的谬误，探索出一条真正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当代作家队伍中，首先与这种社会思潮和时代要求相呼应的正是“复活”的作家群，他们迅速地在自己的创作中作出了反应。当然，这又是他们独特的生活道路所决定的。

五十年代，这些作家还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们那纯洁稚嫩的心感到代替黑暗而来的光明是多么眩目、明媚，牢牢地印上了唯一的社会主义的信念。光明的印象是如此强烈，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如此坚定，连以后二十年的冤屈和苦难都未能使它们泯灭。正如王蒙所说的那样：“生活是多么美好！这一直是我的心灵的一个主旋律，甚至于当生活被扭曲、被践踏的时刻，我也每每惊异于生活那种本身的力量，那种不可遏止、不可抹杀、不可改变的清新活泼。即使被错戴上‘帽子’，即使被关进了牛棚，即使我们走过的道路有过太多的曲折和坎坷，然而，生活正像长江大河，被阻挡以后它可能多拐几个弯，但始终在流动、在前进，归根到底它是不可阻挡的。”②当

① 《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第45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② 王蒙：《漫话小说创作》第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他们像做梦一样地得到平反，再次拿笔创作的时候，这种印象和信念也仿佛复活了。正是这一点使他们始终把自己和祖国、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紧密地血肉般地联系在一起。用别林斯基的话来说，就是“在他的灵魂里，在他的心里，在他的血液里，负载着社会的生活：他为社会的疾病而疼痛，为社会的苦难而痛苦，随着社会的健康而蓬勃发展，为社会的幸福而感到快乐。”①张贤亮曾经在给李国文的信中写道：“我是这样想的，对你我这样历经坎坷，命运多蹇的人来说，即使你在贵州的‘群专队’里，我在宁夏的劳教农场里，也都在思虑着祖国的命运。痛苦的生活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的。”②这的确很剀切地表达了“复活”作家们的思想感情特点。

除此以外，二十年的底层生活又使他们和普通工人、农民、各行各业的老百姓打成一片。岂止是打成一片？他们本身就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化为工人、农民、普通平民甚至囚犯的一员，成为新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经过“同化”的一代特殊作家。他们不是隶属于作家这个阶层，而是隶属于普通百姓的阶层；他们对人民的生活状况，通过亲身经受而了如指掌，比任何一代作家都要更深切地懂得人民的甘苦，更迫切地要求改变人民的现状。他们对新时期以前的生活有完整的历史的了解，对生活的反映也是完整的历史的反映。

出现历史地描写生活的创作倾向，也是由文学创作的自

① 《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第45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张贤亮：《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社会改革者》，《百花洲》1984年第2期。

身运动的规律所决定的。十年动乱给文学带来十年空白，而填补空白的时机已经来到。三十年极左错误给文学带来了三十年不够清晰和正确的反映，而拭去历史的尘埃、廓清一切的时机也已经来到。今天的现实生活本身就是对过去的一种匡正，文学的匡正也势所必然。在“复活”作家群的艺术生命史上，也有空白的十年，欠缺的十年，他们也想补上，也想挽救。他们既是过去生活的最好见证人，又是生活在现时的同时代人，最适宜完成填空补缺的文学的历史任务，自然而然形成历史地描写生活的倾向。

随着他们作品的踪迹，我们看到：

王蒙的《布礼》以主人公的心理感受为线索，把三十年的历史糅合在一起，用年轻的政工干部、诗人钟亦成的命运概括了他们这一代作家的命运，突出“五七年打成右派”和“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两次厄运的沉重打击。这部中篇小说是作者热情而冷静的自我倾吐，也是“复活”作家群的自我倾吐。他们的理想和信念，遭遇和感受，思考和剖析，都在其间了。作者打破时间顺序，把一幅幅不同历史时期的画面放在一起作两相对照，产生出了异乎寻常的艺术判断力——判断出谬误，产生出了异乎寻常的传达感情的力量。王蒙认为，他的另一部小说《蝴蝶》“更是表现了我那用有限的形式大跨度地来思考我们的历史，思考我们的现实，思考我们的城市、乡村。”^①

在高晓声笔下出现了农民的造屋史，农民的吃饭史。前者是时间跨度三十多年的《李顺大造屋》，后者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连续而成的陈奂生系列小说。高晓声用一种朴实

① 王蒙：《漫话小说创作》第4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无华的叙述和素描，把李顺大那充满着希望和失望、奋斗和忍耐、痛苦和欢欣的三起两落的造屋史完整地表现出来，成为农民命运的真实缩影，成为整个国家兴衰的参照。作者清楚地意识到这样历史地反映生活的意义：“三十年中我们遭到两次灾难，那两次灾难都是由于党的路线出了毛病。这毛病害苦了李顺大，害苦了大家，害苦了整个国家和民族。它何止阻碍了李顺大造成房子，更严重的是阻碍了社会主义大厦的建成。如此，《李顺大造屋》就具备了重新认识这一段历史的意义。”①四篇陈奂生系列小说（《“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也是如此，从建国后落笔，一直写到现在，既有陈奂生多少年来当“漏斗户”主时饥肠辘辘的生活图景，也有陈奂生肚皮吃饱后上自由市场做买卖，当社办工厂采购员的有趣经历，还有新时期农村大变革到来之际，陈奂生面对自己掌握命运的新变化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和信心，十分完整。

如果把陆文夫的《小贩世家》和《美食家》合在一起，简直就是一部城市商业发展史。《小贩世家》以卖馄饨的朱源达大半生的经历，鲜明地勾勒出一条独特的小贩之路，这条路上的每一个坑坑洼洼，都映照出时代风雨的吹打。在对时时受到极左路线流风余沫冲击的小贩历史命运描述之中，提出了个体户生存的现实问题。《美食家》则以国营饭店的种种变迁，一一检点前进道路上的失误和教训，通过饭店经理高小庭的自我反省，解剖了左倾幼稚病。五十年代“饭店革命”带来的祸患，六十年代的“瓜菜代”和“高级菜”，此后十年“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兴旺发达中的矛盾，均被囊括进

① 高晓声：《生活和“天堂”》，《人民日报》1984年7月23日。

去，甚至追溯到美食垄断于寄生者、吃客朱自治之流手中的年代，联系到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创造美食文明的历史。以一部“吃史”，浓缩了三十年来我们的经济工作，不能不令人折服。

从历史的深处去追踪党和人民、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从而把极左路线对这种关系的破坏触目惊心地揭示出来，使人痛心疾首，这是李国文的《月食》所达到的深度。他的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的历史感更为强烈，标志着作者历史地描写生活的高水平。这部小说，立足于现实，以当代改革者刘钊为主人公，却摄进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社会历史，三个时代的五次历史更替。它的最大成功就在于，不是浮在表面写改革，而是在深广的历史土壤中显示出改革的必然性，显示出人物行动的丰厚的历史依据，把“时代的兴衰、尘世的沧桑、家庭的嬗变”浓缩于一座建筑物之中，出现一种史诗般的文学规模。

张贤亮始终在对自己几十年来所经历的一条监禁劳改的道路进行深沉的思索，思索的重点则放在改造、劳动、劳动人民等方面。这种深思使他的作品具有非凡的气度和见识。他把非人的生活和要做人的生存要求的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展现出来，同时表达对极左路线的控诉和对劳动与劳动人民的讴歌的错综复杂的感情。他从“灵”与“肉”两个方面，即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去反映知识分子的变化过程，把物质上的饥饿和温饱、精神上的沉沦和发展联系在一起，通过现实和历史的交织对比表现得无比深刻。先有《灵与肉》，后有《绿化树》，先是许灵均，后是章永璘，都闪烁着这种耀眼的独特的光彩。

在我国当代作家中，也许没有人能够象张弦那样历史地

反映婚姻恋爱的悲剧，反映妇女的命运。他并不着眼于婚姻爱情小说中常见的感情问题，而着力寻觅婚姻恋爱问题上的历史沉淀物，以此反映社会的历史发展情况。《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两代母女三人的命运说明了什么？张弦回答得好：“眼前这块土地，曾被几千年封建的盐碱浸蚀，党的阳光滋养了它，社会主义的犁铧翻耕了它，但是极左的阴霾不是又使它板结起来，泛出灰蒙蒙的碱霜了吗？爱情是需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营养才能生长的。她将这里遗忘了，不正是意味着这里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遗忘了吗？”①《挣不断的红丝线》的主人公傅玉洁曾经是一只在爱情的空中自由飞翔的小鸟，受尽风雨的吹打，飞了一个大圆圈以后，又飞回现成的窝巢，因为她恍然悟到金丝笼子的可贵。傅玉洁摆脱过、挣不断、终于将她引向齐副师长的婚姻的红丝线是什么？是舒适而高贵的生活，是物质力量。傅玉洁的圆圈式的婚姻道路，也正可悲地说明了物质对人们的诱惑力，而这诱惑力是历史地形成的。

从上面列举的这些作家作品来看，“复活”作家群历史地描写生活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种倾向在新文学史上以往的作家身上有过，在当代的另外一些作家身上也有；但是，它集中地、强烈地、鲜明地出现在一群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的作家身上，出现在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动的新旧交替的新时期，产生出一大批列于当代文学之首的力作，不能不说是一个突出的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它不仅在“复活”作家群的创作实践中自然形成，而且也被他们作为自觉的文学主张而倡导，把它称为历史主义的文学思潮也满够格

① 张弦：《感受与探索》，《电影艺术》1982年第5期。